

城乡流动背景下的农村养老脆弱性：人口结构转型、家庭结构变迁与政策支持协同研究

任秋菊

贵州大学贵州基层社会治理创新高端智库，贵州 贵阳

收稿日期：2026年4月28日；录用日期：2026年8月12日；发布日期：2026年8月20日

摘 要

在快速城镇化和人口深度老龄化的双重进程中，我国农村地区正经历着最为严峻的养老挑战。大规模的青壮年人口城乡流动，不仅直接改变了农村的人口年龄结构，更深层次地瓦解了传统家庭养老所依赖的代际共居与即时照料基础。本文旨在从“人口结构变迁-家庭功能转型-政策支持体系”三重维度，交叉分析当前中国农村养老“脆弱性”的生成机制与多维表现。研究发现，农村养老已陷入“留守老人”主体化、家庭养老空巢化、社会支持碎片化的“三重困境”。基于此，本文提出构建以“县域”为基本单元、以“整合”为核心策略的养老服务体系。该体系强调通过政策创新，整合医疗保障与长期照护资源，激活农村社区与低龄老人互助潜能，引导银发经济要素向县域下沉，并善用适老化技术弥补服务缺口，从而形成一种既符合农村社会经济现实，又能有效回应老年人多元化需求、抵御养老风险的新型支持模式。

关键词

农村养老，人口流动，家庭变迁，养老脆弱性，社会政策

The Vulnerability of Rural Elderly Care in the Context of Urban-Rural Migration: A Collaborative Study of Demographic Transition, Family Structure Change, and Policy Support

Qiuju Ren

High-End Think Tank of Guizhou Primary-Level Social Governance Innovation,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Received: April 28, 2026; accepted: August 12, 2026; published: August 20, 2026

文章引用：任秋菊. 城乡流动背景下的农村养老脆弱性：人口结构转型、家庭结构变迁与政策支持协同研究[J]. 老龄化研究, 2026, 13(8): 326-332. DOI: 10.12677/ar.2026.138562

Abstract

In the dual process of rapid urbanization and deep population aging, rural areas in China are facing the most severe challenges in elderly care. Large-scale urban-rural migration of the young and middle-aged population has not only directly altered the age structure of the rural population but has also fundamentally eroded the intergenerational co-residence and immediate caregiving foundation on which traditional family-based elderly care relies. This paper aims to analyze the formation mechanisms and multidimensional manifestations of the “vulnerability” of elderly care in rural China from three interconnected dimensions: demographic transition, transformation of family functions, and the policy support system. The study reveals that rural elderly care is caught in a “triple dilemma”: the predominance of “left-behind elderly”, the hollowing out of family-based care, and the fragmentation of social support.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construction of an elderly care service system centered on the “county” as the fundamental unit, with “integration” as the core strategy. This system emphasizes integrating medical care and long-term care resources through policy innovation, activating the potential for community and mutual support among younger seniors in rural areas, directing silver economy resources toward the county level, and leveraging age-friendly technologies to bridge service gaps. The goal is to establish a new support model that aligns with rural socio-economic realities while effectively addressing the diverse needs of the elderly and mitigating elderly care risks.

Keywords

Rural Elderly Care, Population Mobility, Family Transition, Vulnerability of Elderly Care, Social Policy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及文献综述

1.1. 引言

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来看,我国乡村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显著高于城镇及整体老年人口比重,人口老龄化呈现显著的“城乡倒置”特征。与此同时,大规模的城乡人口流动持续深化这一格局。从当前全国农民工总量来看,外出农民工占比过半,其主体正是从农村流出的青壮年劳动力。这种“乡-城”单向上的人口迁移,在推动城镇化发展的同时,也直接导致了农村人口结构的加速老化与家庭结构的深刻变迁,催生了规模庞大的“农村留守老人”群体。当前我国农村养老正面临“留守化”“空巢化”与“高龄化”三化叠加的严峻挑战。在这一宏观背景下,植根于多代同堂、子代赡养的传统家庭养老模式,其社会经济基础正在发生结构性弱化。那么,在传统家庭养老功能持续弱化的进程中,中国农村养老体系究竟面临着怎样的系统性风险?这些风险是如何在人口流动、结构变迁、家庭转型与政策调试等多重因素的复杂互动中生成与演化的?对上述问题的深入剖析,不仅是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民生短板的关键切口,更是构建具有韧性、包容性的农村养老支持体系的逻辑起点。

1.2. 文献综述

国内外学界围绕中国农村养老议题已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主要沿着以下几条路径展开:第一条

路径聚焦宏观人口结构分析,主要运用人口学方法,通过预测模型揭示农村老龄化的未来趋势、老年抚养负担以及劳动力供给变化,如杜鹏[1]、宋佳莹[2]等学者的相关研究,这类研究清晰勾勒了风险的宏观背景,但对风险传导的中微观机制关注不足。第二条路径聚焦具体养老服务模式探讨,主要从社会保障与公共管理学科出发,研究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如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保障水平、养老服务设施的运营困境、医养结合在乡村的实践瓶颈等,如青连斌[3]、林宝[4]等学者的相关研究,这类研究直面操作层面的挑战,但往往将养老问题相对孤立地视为一个“服务供给”问题。第三条路径聚焦代际关系与家庭转型,主要从社会学、伦理学视角,分析人口流动如何改变代际居住安排、经济流转、情感联系与赡养实践,探讨孝道文化的现代变迁,如贺雪峰[5]、范成杰[6]等,这类研究深入家庭内部,揭示了风险的微观基础,但与宏观结构、政策体系的关联分析有待加强。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为我们理解农村养老问题的不同侧面提供了坚实基础,但大多侧重单一维度或两个维度的分析。将“乡-城人口流动”这一核心动力,与由此引发的“农村人口年龄与家庭结构变迁”,以及旨在应对挑战的“养老保障与服务政策体系”置于一个统一的、动态的互动框架中进行系统性、交叉性的机制分析,仍有深化的空间。特别是,对于这三者如何相互交织、共同塑造农村养老“脆弱性”的具体表现与生成逻辑,尚缺乏整合性的理论阐释。

为系统解析农村养老的系统性风险及其生成机制,本文构建一个“人口结构-家庭功能-政策支持”三重维度的交叉分析框架。该框架认为,农村养老的脆弱性并非单一因素所致,而是源于以下三个维度的结构性张力及其相互作用:一是人口结构维度。乡-城人口流动直接导致农村劳动力资源持续净流出与老年人口比例急剧上升,造成老年抚养负担沉重,形成“谁来养老”的基础性人力危机。二是家庭功能维度。流动导致代际空间分离,削弱了家庭养老所依赖的日常照料、即时慰藉与情感支持功能,同时动摇了传统孝道规范,使家庭养老从一种稳定的制度化安排转变为充满不确定性的实践。三是政策支持维度。面对前两重维度带来的巨大需求,现有以“低水平、广覆盖”为特征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以及碎片化、供给不足且往往与农村实际脱节的社会化养老服务网络,难以形成有效的托底与补充作用。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采用混合研究方法。定量层面,主要通过对统计年鉴数据及人口普查相关权威数据进行二次分析,刻画人口流动、结构老化与家庭变迁的宏观图景。定性层面,运用政策文本分析法,系统梳理国家及地方层面关于农村养老保障、养老服务、乡村振兴与社会治理的相关政策文件,评估其回应性;同时,结合既有高质量实证研究中的典型案例,对脆弱性的具体表现进行深描,使机制分析更加丰满立体。总之,农村养老问题的解决,不仅依赖于制度设计与资源投入,更与全社会对老龄化的认知、对老年价值的认同、以及对代际责任的理解密切相关。因此,探讨其应对策略,需将社会观念与文化建构纳入分析视野,特别是作为社会思想高地的高等教育,其育人理念与内容对塑造未来社会主流老龄观具有奠基性作用。

2. 三重维度交叉:农村养老脆弱性的生成机制

农村养老脆弱性是在人口乡城流动、家庭结构转型与政策支持滞后等多重压力下形成的系统性困境。本部分将从人口结构、家庭功能、政策支持三个维度,系统解构其生成机制。人口流动导致农村老龄化程度加深、高龄与失能老人比例攀升,而劳动年龄人口外流则削弱了传统家庭养老的人力基础,加剧“谁来看护”的现实困境。与此同时,传统代际支持因空间离散而功能弱化,社会化养老服务又面临供给不足、供需错配与城乡政策“水土不服”等挑战。这三重维度的叠加与互动,共同构成了农村养老风险生成与积累的逻辑闭环。

(一) 维度一:人口结构的“失能”与“失衡”

主体失能,使得刚性照护需求急剧扩张。农村老年人口不仅在数量上快速增长,其内部结构也在向

高龄化、失能化演进，形成了日益庞大的高照护需求群体。截至 2021 年末，全国 60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26736 万人，占总人口的 18.9%；全国 65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20056 万人，占总人口的 14.2%。全国 65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抚养比 20.8%¹。更为严峻的是，受慢性病患者率高、医疗资源可及性较低、劳动生涯积累的机体损耗等因素影响，农村老年人口的失能、半失能比例显著高于城镇。这一群体对长期、专业的医疗护理和生活照料有着刚性且持续的需求。然而，与这种迅速膨胀的、专业化、高强度的照护需求相对应的，却是农村地区家庭照护能力因人口外流而削弱，社会化专业照护资源极度匮乏，供需之间存在巨大鸿沟，构成了养老脆弱性的首要表现。

结构失衡，使得人力资源基础的持续削弱。乡-城人口流动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村的人口年龄结构，导致抚养比严重失衡。更为关键的是，流出的主要是年轻、有活力、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的劳动力，而留在农村的老年人口中，相当比例自身也属于“准老年人”或“低龄健康老人”，他们既要自我养老，还往往承担着隔代抚育和农业生产的责任。这种“老年抚养老年”的结构性困境，使得传统意义上的家庭内“潜在照料者”资源被严重掏空。展望未来，根据人口统计与预测模型，在现有城镇化趋势和低生育率背景下，农村青壮年人口外流趋势难以根本逆转，农村老年抚养比预计将在未来二十年内持续攀升。这意味着，支撑农村养老，特别是满足高龄、失能老人照料需求的“人力资源池”将持续萎缩，“谁来看护”的根本性问题将日益凸显，人口结构带来的基础性支撑危机是农村养老脆弱性的长期性、结构性根源。

（二）维度二：家庭功能的“离散”与“重构”

一是代际支持的物理离散与功能缺位。大规模、长距离的城乡人口流动，最直接、最深刻的冲击是传统家庭养老模式的物质基础——代际空间共居。全国性调查数据显示，农村老年人单独或仅与配偶居住的“空巢”比例已超过半数，成为主流居住模式。这种物理空间的分离，使得基于“近身伺候”的传统家庭养老功能——特别是日常起居照料、突发疾病时的紧急救助、高频次的情感交流与精神慰藉难以实现。子女往往只能在节假日短暂返乡，形成“节日性赡养”，无法满足老年人，尤其是失能、高龄老人持续性的照料需求。这导致农村老年人在面临生活困难、疾病侵袭和精神孤独时，难以获得来自家庭的即时、有效支持。这种“日常照料真空”和“情感慰藉赤字”，是代际研究在流动时代必须正视的核心困境，也是家庭养老功能实质性弱化的关键标志。

二是经济支持的双刃剑与责任伦理的流变。在经济支持层面，外出务工子女提供的“汇款”构成了留守老人重要的、有时是主要的收入来源，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其物质生活条件，体现了家庭支持的经济维度依然存在。然而，这种“汇款经济”也具有“双刃剑”效应。一方面，它可能强化“经济供养”等同于“养老尽责”的工具性认知，淡化或替代了非经济性的、更需投入时间与情感的照料责任。另一方面，空间分离使得赡养行为变得抽象和间接，传统孝道中强调的“敬”与“顺”，即日常生活中的尊重、顺从与陪伴，在物理隔离下难以践行，容易退化成为一种“仪式性”的、以金钱给付为主的、责任边界模糊化的行为。在现代化和个体主义价值观的渗透下，传统孝道文化正在经历深刻的现代调适。子代对个人发展的追求、对城市生活方式的向往，与对亲代的赡养责任之间可能产生张力，原有的、具有强约束力的代际契约正变得更具协商性和不确定性。这种代际责任伦理的流变，进一步削弱了家庭养老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构成了养老脆弱性的文化与心理层面。

更深层次看，人口流动不仅冲击了家庭养老的实践形式，也动摇了其文化根基。当年轻一代在城乡迁移中接受现代性与个体主义价值观的洗礼，而传统“孝道”伦理的传承场域萎缩时，代际间的责任认知与伦理规范面临重构压力。这提示我们，养老支持体系的建设，必须同步关注代际伦理的社会化再生产机制，这也正是高等教育中通识教育必须积极关注的。

¹<https://www.nhc.gov.cn/llyks/c100157/202210/bd22366653f04cd782e04bb0cad9f445.shtml>

(三) 维度三：政策支持的“碎片”与“悬空”

首先，社会保障的“低水平、广覆盖”与长期照护缺位。当前，我国农村已建立起覆盖绝大多数老年人口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实现了制度上的全覆盖。然而，其保障水平普遍偏低。城乡居民基本养老金月均水平仅数百元，远不足以支撑基本生活，更遑论支付照护费用；基本医疗保险虽能报销部分医疗开支，但针对失能老人最需要的、非治疗性的长期生活照料和护理服务，尚未被普遍纳入支付范围。这种“保基本、保医疗、不保长期照护”的格局，使得农村家庭在面对失能风险时，极易因支付能力不足而陷入“一人失能，全家失衡”的困境。尽管国家正在试点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但其覆盖范围主要在城市职工，对广大农村地区的覆盖进程缓慢。因此，在养老保障和社会政策层面，存在一个针对失能风险的社会化、制度化财务保障的显著缺口。

其次，养老服务的“供给短缺”与“供需错配”。在服务供给侧，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存在总量不足与结构失衡的双重问题。一是供给总量严重短缺。农村养老机构床位总量不足，且多优先保障特困人员（“五保”老人），面向社会老人的床位有限；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覆盖率低，且普遍存在运营经费不足、服务内容单一、可持续性差的问题。二是专业照护人员极度匮乏。由于工作环境、薪酬待遇、社会认同等因素，专业护理人员“引不进、留不住”现象在农村尤为突出。三是严重的供需错配。现有机构养老服务多参照城市模式，集中居住，与农村老人“恋家”“不愿离开熟悉环境”的偏好冲突；服务项目往往“高大上”，与农村老人的实际支付能力（有效需求）不匹配；农村老人居住分散，使得集中式服务的可及性大打折扣。供给的“缺”与“贵”，与需求的“散”与“弱”并存，导致许多服务设施“门可罗雀”或“名存实亡”，政策投入的效能未能充分发挥。

最后，城乡政策的“二元惯性”与“水土不服”。长期以来，我国的社会政策设计存在明显的“城市中心主义”惯性。许多养老服务和适老化相关标准、规范、发展模式，主要是依据城市的人口密度、居住形态、基础设施和消费习惯制定的。例如，无障碍环境建设标准、智慧养老产品设计、老年宜居社区指南等，往往默认了较高的建筑密度、完善的物业管理和较高的数字化素养。当这些标准和模式“平移”到农村时，常面临“水土不服”：在居住分散的村落推广集中式养老服务点成本过高；智能穿戴设备可能因网络信号差、老人不会使用而沦为摆设；适老化改造的标准与农村自建房的建筑结构不匹配。这种政策与标准的“二元惯性”，导致旨在支持农村养老的资源投入可能因脱离实际而效率低下，甚至造成浪费，使得好的政策意图“悬空”，难以落地生根、惠及于民。

3. 整合与创新：构建县域整合式养老服务体系的路径探索

面对“人口结构失衡、家庭功能弱化、政策支持滞后”三重维度交织生成的系统性脆弱性，任何零散、孤立、补救式的干预措施都难以治本。亟需树立系统性思维，构建一个能够有效整合资源、协同各方、回应多元需求的韧性支持体系。县域作为我国行政执行和社会治理的关键单元，具有承上启下、要素齐备、贴近基层的独特优势，是统筹城乡资源、破解农村养老困局、实现政策精准落地的最佳操作平台。基于此，本文提出构建“县域整合式养老服务体系”的总体构想，其核心理念在于“整合”，旨在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将分散的要素凝聚为支撑农村养老的合力。

(一) “整合”是应对农村养老资源碎片化、服务割裂化问题的根本出路

一是资源整合。打破部门壁垒，统筹整合卫生健康、民政、医疗保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残联、乡村振兴等系统的政策、资金、设施与人力资源。推动“医、养、康、护、娱、学”等多要素一体化配置，避免重复建设与资源浪费，实现从“多龙治水”到“攥指成拳”的转变。

二是层级整合。构建并强化“县-乡-村-家”四级功能清晰、上下联动、转介顺畅的服务网络。县级层面重点建设综合性养老服务中心，承担失能特困人员集中供养、区域示范培训、资源调度和行业监

管职能：乡镇层面转型提升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发挥对特困老人兜底保障、对社会老人开放入住、为居家社区养老提供支撑的枢纽作用；村级层面依托互助养老站点、农村幸福院等，发展邻里互助、日间照料、文化娱乐等接地气的服务；家庭层面则通过推广“家庭养老床位”，将专业的照护服务、适老化改造和智能监测送户上门。四级网络层层赋能，将专业化服务延伸到老年人身边、床边。

三是方式整合。摒弃非此即彼的服务模式思维，推动机构养老、社区养老、居家养老融合发展，并积极嵌入“智慧养老”元素。支持养老机构打开大门，将专业服务辐射到周边社区和家庭；鼓励社区服务设施与机构建立协作关系，实现资源共享；利用信息技术打造县域智慧养老平台，实现服务需求一键呼叫、服务过程智能监管、资源调度高效精准。

（二）“整合”理念指引下的路径创新与实践

第一，强化“医养结合”核心支撑，化解健康照护风险。健康问题是农村老人最大的忧患。必须深度推动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有机融合。一是服务下沉：依托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明确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在老年健康管理、慢性病防控、失能等级评估、康复护理指导、安宁疗护等方面的职责，将其纳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重点内容。二是机制创新：在县级层面推动建立卫健、民政、医保部门的常态协调机制，简化医养结合机构审批，探索符合农村实际的“医养签约”“养办医”“医办养”等多种模式。三是支付突破：积极推动基本医保基金用于符合规定的家庭病床、日间护理等服务支付，并加快将符合条件的治疗性康复项目、安宁疗护费用纳入医保范围，为医养结合提供支付保障。

第二，激活“互助养老”社会资本，重构社区支持网络。充分挖掘农村熟人社会中的社会资本与人力潜力，是应对专业人力短缺的现实选择。一是制度化发展“互助时间银行”：鼓励低龄、健康老人为高龄、失能老人提供力所能及的照料、陪伴、代办等服务，并将服务时间存储，未来可兑换同等服务或实物激励，形成“今天我助人，明天人助我”的良性循环。二是推广“老伙伴”计划：以村民小组或自然村为单位，组织邻里结对，建立常态化探访、应急互助机制。三是培育社区社会组织：支持成立老年协会、志愿服务队等，在村“两委”引导下开展各类文化娱乐、互助关爱活动，重建农村老年群体的社会连接与精神家园。

第三，培育“县域银发经济”市场生态，激发内生动力。解决农村养老问题不能仅靠政府投入，需引导市场和社会力量参与，形成多元供给格局。一是优化营商环境：县级政府应出台土地、税费、补贴等一揽子扶持政策，吸引社会资本投入面向农村中低收入群体的普惠型养老机构、社区嵌入式服务网点。二是发展特色老龄产业：结合乡村旅游、生态农业，探索“养老+田园”“养老+康养”等符合农村资源禀赋的特色模式。扶持本地老年用品生产和销售网络，发展适合农村的质优价廉的康复辅具、老年食品服装等。三是开发老龄人力资源：将有意愿、有能力的低龄老人组织起来，参与养老服务、乡村治理、文化传承等，变“养老”为“享老”，变“负担”为“资源”。

第四，善用“适老化技术”弥补鸿沟，提升服务可及性。技术是破解农村地广人稀、服务成本高难题的利器。一是推广普惠实用型技术产品：重点推广操作简单、价格低廉、可靠性高的紧急呼叫器、智能烟感报警、体征监测床垫、GPS定位手环等，优先保障高龄、独居、失能老人家庭。二是建设县域智慧养老平台：整合各类养老服务资源，提供一站式信息查询、服务预约、安全监控、远程问诊等功能。可与基层网格化管理平台对接，实现智能预警、快速响应。三是开展“数字反哺”行动：通过社区教育、家庭帮扶等方式，帮助农村老人跨越“数字鸿沟”，学会使用智能手机进行基本社交、获取信息、享受便捷服务。

第五，优化“政策工具箱”精准赋能，筑牢制度保障。精准、协同、可持续的政策体系是整合式服务落地的根本保障。一是加快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向农村拓展：在总结城市试点经验基础上，设计符合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和老人支付能力的参保、筹资、待遇支付方案，为失能老人获得长期照护服务提供稳定的

费用支撑。二是提高补贴的精准性与效能：改“补供方”为“补需方”与“补供方”相结合，探索建立针对失能、高龄、经济困难等不同老年群体的分级分类护理补贴制度，并推动补贴异地结算，方便随迁老人。三是实施“家庭照护者支持计划”：通过发放护理津贴、提供免费照护技能培训、给予“喘息服务”（临时托管）、落实照料假等方式，切实支持承担主要照护责任的家庭成员，巩固家庭养老的基础地位。

第六，夯实“积极老龄观”的社会文化基础。构建可持续的养老服务体系，需要与之匹配的社会观念土壤。在此，高校通识教育可发挥独特的先导性作用。通过将老龄化国情、生命伦理、代际正义、老年价值等议题系统性地融入通识课程与校园文化，高校能够塑造科学认知，帮助作为未来社会中坚的年轻学子超越对老龄化的片面、消极想象，理解其作为生命必然阶段的多维价值与社会意涵。涵养责任伦理，引导青年在个人发展与社会责任、代际契约与现代生活之间进行理性思考，培育基于平等、尊重与互助的新型代际责任感。培育潜在人才与倡导者，启发学生对老龄事业、银发产业、老年学研究的兴趣，为相关领域储备具有人文关怀和专业素养的后备人才；同时，培养的每一位学生都将是“积极老龄观”在社会各领域的潜在传播者和实践者。

4. 结论：迈向韧性与包容的农村养老未来

本文构建的分析框架揭示了农村养老问题是发展问题、人口问题、社会问题与政策问题的复杂交织。解决之道必须具有整体性和协同性。“县域整合式体系”的提出，是对碎片化治理的一种回应，其成功关键在于县级政府的统筹能力、多元主体的有效参与以及持续的财政支持。在更广阔的视野下，农村养老问题的根本缓解，也与城乡融合发展、乡村振兴战略紧密相连。在此意义上，通过城乡一体的职业教育与技能培训，为农村培养本土的养老护理专业人才；通过广泛的社会宣传与教育，重塑包括流动子代在内的全民新型孝道观与养老责任观，是构建长效社会支持体系不可或缺的文化与人力基础。这体现了老龄化社会政策需要与更广泛的社会发展议程相协同。

中国农村的养老挑战，是现代化进程中代际关系、城乡关系深刻调整的集中体现。应对这一挑战，不能仅仅依靠家庭或个人，更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兼具包容性与韧性的社会支持系统。以县域为单元，整合多方力量与资源，构建医养、康养、智养相结合的整合式养老服务体系，是当前阶段积极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筑牢民生底网的必然选择，也为全球类似情境下的老龄化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的有益探索。

基金项目

本文系《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通识教育融通创新研究》(项目编号：GDTS2023008)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 [1] 杜鹏. 中国农村养老服务现状与发展方向[J]. 中国社会工作, 2018(26): 26-27.
- [2] 宋佳莹. 人工智能技术如何影响社会保障发展——基于人口老龄化压力与多元主体响应的分析[J]. 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6, 42(2): 89-105+168.
- [3] 青连斌, 郑雄飞. 协同善治与机制创新：新时代养老产业高质量发展路径探索[J]. 中州学刊, 2025(11): 85-92.
- [4] 林宝. 康养结合：养老服务体系新阶段[J].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 2021, 35(5): 9-18.
- [5] 贺雪峰. 应对农村老龄化的中国方案[J]. 贵州社会科学, 2024(9): 133-144.
- [6] 范成杰. 农村家庭养老中的性别差异变化及其意义——对鄂中H村一养老个案的分析[J].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23(4): 104-109.